

新
中
国
记
忆

■

三

■

李依凡 主编

目 录

回归的人性（续）	1
民意在涌动	1
知青返城	4
“洋插队”	7
高考来临	11
法律意识的觉醒	15
金钱观念的转变	17
股票买卖活动	18
农民上网	21
麻雀与“四害”	24
足不出户的赚钱	27
全家炒股运动	32
下海风潮	35
邮票市场异军突起	39
下岗的痛苦抉择	44
被解放的男女	46
婚姻快餐	47
“坏”与“爱”	50
性保健兴起	53
社会符号的变迁	54
“同志” 的消失	55
“姓名” 地位的提升	58
社会变革中的汉语	62
新民俗文化	67
洋人节日被青睐	67
狗与人的身份较量	70
怀旧风潮	74

谁在“酷”到底	77
“吧”文化的西风	79
钟点工与家务解放运动	82
华夏大地的选美	85
舞蹈风云再起	88
消费经济升温	93
消费观念的转变	93
洋货登堂入室	97
娱乐场所鳞次栉比	100
早餐革命	102
衣着文化	104
美容运动	108
“红旗”轿车	112
居住改变生活	115
体育休闲活动	119
“快餐”文化来临	121
流行歌曲的记忆	122
摇滚青年	125
骚动的诱惑	127
读书人的大餐	132
春节晚会	135

回归的人性（续）

民意在涌动

一天，几位邻居在一起议论物价。一个说：“哎，这年头，除了咱这身价不涨，啥都在涨价。”另一个接茬说：“涨价涨价，越涨越怕。怕也要涨，涨了更怕。”这便是顺口溜的一个实例。其实，当今的顺口溜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广泛，可以说，九州方圆，天南地北，处处都有顺口溜流传着。顺口溜已成为中国老百姓常说常新的话题，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顺口溜又称民谣，在我国源远流长。据《古谣谚·凡例》记载，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顺口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它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从历史上看，每当在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发展的时期，顺口溜往往特别流行。今天，我国又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环境更加宽松，人们有更多言志抒情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改革尚未完成，新旧体制并行、摩擦、冲突，旧的规范在解体、渐失约束功能，而新的规范正在建立却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许多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现象纳入适当的规范，对一些钻体制空子的失范行为也难以有效制止。于是乎，人们在对改革开放充满希冀和热望中，又不可避

免地产生种种的困惑、迷茫甚至焦虑、激愤。这样，便有众多的顺口溜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内陆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广大的农村，从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到每个家庭，迅速地流传开来，并久传不衰。

当今的顺口溜林林总总，数目繁多，但它们莫不关乎世风人心，莫不传达百姓情绪。可以说，它们是民众心态的折射，是民间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并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认识问题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制约、监督和预警作用。常言道：“上山下山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透过这些顺口溜，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民心民意，进而及早注意并提出相应措施，防止或消除某些被动局面的出现或存在。

——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之风触目惊心。80年代以来，公款吃喝成风，此后由风而疯。有些干部将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置之脑后，一味讲排场、比阔气，使干群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这方面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之广、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要想换口味，多开各种会；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千方百计找个理由把“吃”和公家的事联系起来，吃也要吃得“名正言顺”，头戴乌纱的馋官们何尝不是如此？又如：“村长吃土（卖地），乡长吃肚（超生罚款），县长吃库（财政款）。”“团结你我们他，共同吃国家。”“只要为集体，咋喝咋有理。”“小吃小办，大吃大办，好吃好办，不吃不办。”再如：“别看咱是国贫县，机关大楼赛宫殿；别看我们厂子亏，领导天天端酒杯；别看单位经费少，时常还往国外跑；别看山乡底子薄，吃喝费用没少过。”吃喝到这个份上，奢侈到这个程度，这治嘴工

程、戒奢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在批评某些腐败现象的顺口溜中，涉及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相当多。如：“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子。”“懒人觉多，官僚主义会多。”“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又如：“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活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老百姓对此的讽谏还有很多。要杜绝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就要在用人上实行民主，听取群众意见；实行公开竞争，以能取官。

——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反映。在民间，人们对好些政策的反映，总是通过顺口溜的形式表达出来。如：“富了摆摊的，穷了上班的，苦了靠边的，醉了当官的。”反映分配上的不公，显然也道出了某些事实。又如：“宁给厂子把磨拉，不给书记倒碗茶”、“有了包和奖，管他思想不思想。”“（思想政治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搞三十年技术当高工，搞三十年行政关系通，搞三十年政工两手空。”这就形象地反映出某些企业党政分开后，企业党组织削弱的问题，而政工干部劳而“两手空”，自然令人心理不平衡。看来，思想政治工作也需改革。

——对社会公德的评价。80年代、90年代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日益淡薄，社会公德水平日见下降，有人便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50年代人爱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大目标越来越小，小目标越来越大；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政治觉悟越来越低；我们为人人越来越淡薄，人人为我们越来越浓厚。”“理

想理想，有利就想。”而钱、权、色三者的交易，又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也影响着家庭的稳定。

其实，当今的顺口溜远不止以上这些内容。诸如：“文戏上床，武戏上房”是老百姓的文艺批评，“土地不要动，负担不要重”是说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则讲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等等，不一而足。

知青返城

1968年12月，为了那一句“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全国城镇1647万名中学生就毅然决然地别亲离家，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在北大荒和热带森林等边疆地带，在每一个内陆省份的腹地，迅速地变成特殊农民，准确地说，一个叫做“知识青年”的社会阶层在一夜间形成了。

正如当年潮水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时的轰轰烈烈，10年后这支特殊的大军又潮水一样地回流都市。仅仅计算到1979年，知青的回流率已高达83.9%。这次几乎囊括了一代人的空前的移民浪潮，以其巨大的代价和负效应，注定了是一次悲壮然而失败的迁移。

如果说1978年底之前，知青靠办病退返城还困难重重，关卡林立，那么，到了1978年底和1979年初，知青们已不再用为装病而费那么大的心机了。尽管有关政策、规定并没有字面上的改动，但在实际中那些政策、规定已由为极少数人方可逾越的高度降到了几乎任何知青稍许一抬脚就可迈过去的高度。当地干部不再竭力劝留或阻拦，知青原所在城市也不再设置复查之类的关卡。

两方面的限制既已大为松动或自然消除，大多数知青的返城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知青大返城多走病退这条路，而办理病退的规定又为知青返城放开一条宽宽的通道。同样是办理病退，却再也无须挖空心思，提心吊胆“赶鸭子硬上架”地扮演病入膏肓的角色，或腰间插把利刃言称患肝硬化，令医生触之惊吓，只好放行，现在知青与医生也谈得和颜悦色，平心静气。更有来得痛快地方，办理病退的公章就悬在办公室的门口，只要知青们赶来盖一下就可走人。

单身知青和虽已成婚但双方同为一个城市的知青率先顺利返城，但夫妻双方分别为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和配偶为当地人的知青则在返城的过程中，面临着人生痛苦的抉择。于是，感情基础原本不牢固的，就自然在返城这一极富诱惑力的事物面前彻底崩溃；双方的结合本来就是情深意笃、牢不可破的，则为了已经出生的和将要出生的下一代，不得不采取了“假离婚”方式，能返城的先返城，其他事从长计议。比如在笔者老家农村天津女知青李明兰返城时，已与当地丈夫冀月喜生有两孩儿，她自己返城后，经过多方努力，又把丈夫和孩子都落户天津，可算是其中的幸运者。但更多的就只有离婚，不管你情愿或不情愿、自愿或被迫、恶打恶闹或好离好散。可以说，知青们开了改革开放后高离婚率的先河。

对自己缺乏远见的行为而追悔不迭的不只是那些已婚的知青。杜鸿林先生在《风潮荡落》一书中，还为我们讲述了另一类知青返城的曲折经历。这些知青在大返城浪潮兴起之前就被送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行业工作，因而一度被众多知青视作幸运儿，同那些仍在社队干农活的知青伙伴们相比，他们的心里的确充盈

着满足感和优越感。但时过境迁，当成千上万知青潮水般涌向城市的时刻，他们的心理平衡被彻底打翻，原有的满足感和优越感消失殆尽。他们纷纷要求享受同社队知青一样的待遇，但有关部门并不允许。最后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知青被迫退职，并费尽周折后还是返回了城市。

无独有偶，退职知青的这一返城做法，又为已在非所在城市上学(中专或大专)的知青仿效，他们纷纷退学回到原插队的地方，同未曾上学的知青一样通过办病退或困退返城。有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想返城的终于都返城了。但知青们发现，就像每一次移民都会造就一批游弋于两种文明间的“文化边缘人”一样，知青这一群体无疑就是 20 世纪中国的边缘人之一。原为海南农场的北京知青、现任江苏省社会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妇女问题专家金一虹指出：知青因其所受的都市文明的教育，与农村的农业文明自有难以认同和难以相容的一面，身处农村，他们时时有外来者的感觉，他们依恋都市与依恋母亲的心情是缠绕在一起的，因此他们迟迟不愿与母亲“精神断乳”，他们愿意在保留原有的乡音、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我们是城里人”的感觉；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地返回城市探亲时，他们看出城市已把他们视作“乡下来的亲戚”，城市就这样把他们排除在外了。即使若干年后他们正式返回城市，他们也能感到城市已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始终有一种游离于秩序之外的感觉，有一种不被接受的痛苦。这种心灵烙印，使他们一生都既惶惑又清醒，既为认同危机所扰，又极为独立不羁。如果寻找他们曾经有过的精神流浪轨迹，这些矛盾的性格之所以如此协调地组合在一起，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分析是客观而中肯的。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因此又都回到那让他们思念不已的家园，可是城市毕竟已不是昔日的城市，他们也不再是昔日浮躁的少年了。同时，知青作为整体虽然消失了，但曾为知青的人都有着永远解不开的“知青情结”，那怕他只是做过几个月的知青。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父辈们风华正茂时的革命理想和政治抱负，我们大家也不可能对知青运动这一宏伟的历史事件作出断言，但他们的理想和行为，都不该被冷落，不该被忘却，更不该被含着棒棒糖长大的年青一代们嘲弄！1998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各种纪念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数百万知青大返乡，开始寻找当年的足迹，开始反思理性与激情的距离……而历史，最终将为他们的付出与拥有、苦痛与悲哀作出诠释！

“洋插队”

上海的早晨，曦光微露，大街小巷还沉浸在一夜酣梦的袅袅余音里。就在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已人头攒动，不一会儿就成为一条长龙，那争先恐后的情状绝不亚于早市上抢购数量有限的新鲜蔬菜的热闹景致。二者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抢购的是一种特殊而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70年代末，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之门突然大开，少见寡识的国人一下子被五彩缤纷的世界弄得眼花缭乱，一股“出国潮”随之奔涌而来。进入80年代中后期，50多万因公出国者和更多的因私出国者，一时间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百万出国大军，而且逐年递增，单1989年一年因私出国的人数就已达132727人。

老年人探亲、青年人留学已非时髦，艺术家和个体工商户率领了新潮流，离休干部也开始出国定居。即使留学，也已从读博士、硕士变成了读学士、读高中，15岁的小高中留生成批出现，名牌大学的同学会上，不少班级没出过国的所剩无几。而出境前往国也一时一变，潮头高且猛。开始是奔港澳台探亲，很快就去美国、日本留学，随之又冲上南洋的澳洲海滩，几乎同时南美、非洲、大洋洲和第三世界小国骤然吃香，蒙古、独联体、俄罗斯也大出风头……

出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成为种种场合、各类聊客相聚时的一个永恒而热门的话题。“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就不能出国留学！”成了父母新的教子格言；是否曾在海外镀金，成了有没有出息的高级标杆；考不上大学的也要出国就读，不认识 ABC 的也要出国就业……

当然，就绝大多数出国者而言，他们出国的动机值得赞赏，他们是通过种种关系和努力，堂堂正正地拿到护照和签证的。但也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的出国动机是肮脏的，也玩了不正当的手段，他们削尖脑袋钻空子，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或以色情引诱，金钱收买，刀枪齐上。这自然成为出国潮中的一股浊流！

郝在今先生在其长篇纪实作品《跨出国门》中，将出国潮概括为探亲、留学、移民三次大的冲击波，并形象地指出：探亲波好似盘丝洞探幽，通关密计丢人现眼；留学波有如迪斯尼游览，出行怪招千奇百怪；移民潮更象地下世界潜伏，外洋黑幕耸人听闻。但不管怎样，出国之所以能成潮成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都怀抱着一个“出国发财梦”。都听说欧美是人间的天堂，那里的人既自由又富有，就像神话里说的一样，人人都幻想着

在那里淘金，成为百万富翁，光宗耀祖，福泽子孙。于是，也就有了一个个或潇洒或悲惨的寻梦故事。

都说现代社会“六亲不认”，只有商品、金钱可以冲破一切，但国界都挡不住的却是人类亲缘这最原始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不单是中国人，其他国家在出境问题上，也是探亲最优。

生活中的事常常就是这样尴尬：“文革”之中，亲属的政治作用被强调到了极致，“海外关系”尤其使人谈虎色变，谁还敢提出出境探亲？而一旦国门大开，许多人又唯恐摊不上一个像样的海外亲戚。广东、福建人运气好，那里到处是侨乡，于是他们率先走香港、下南洋、奔美洲，开始了出境探亲寻梦之旅。他们无疑也是出国潮中最幸运的潮头人。

但没有海外亲戚，又想出国的人怎么办？那就千方百计扯一个亲戚出来。“五百年前是一家”，翻开家谱，不愁找不出个海外关系。何况海外生活的中国血统人士至少有三千多万，加一乘数就会发现，有上亿的中国人都有可能扯上海外亲戚。不过扯上亲并不意味着就能很容易地出国，弄一份“经济担保书”远比那来自海外的“邀请信”艰难得多。须知，你扯来的亲戚要为你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国外的生活费负责，他肯吗？

不少海外华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归“根”行为却引来了一批想离“根”的亲戚。当然他们也发挥了中国传统的另一面：亲兄弟，明算账。碍于面子与亲缘，他们也会给你“经济担保”，但那只是形式上的“担保”，绝不会“付出”。道理很明白，他们居住国政府保证给你钱，但实际上你应该自己付钱。这就不错了，人家毕竟为你承担了风险，你也别忘了，这是扯来的亲戚嘛！明白

了这一点，你就不要太叫真儿。

有人总结出国经验说：“要想走得快，就得嫁老外。”于是，扯亲也就有了新发展——结亲的诞生。无论从现实角度还是从法律观点看，结亲这种出国方式有个人的自主选择 and 创造，可以最简易、最快捷地实现出国梦想，不啻为上策之一种。

那些聪明而天生丽质的文艺界女明星们早早瞄准了这一点，她们自然要让自己的美貌充分发挥效益。于是，一颗颗“明星”变成了一颗颗“流星”，她们的消失几乎与她们的成名一样迅速。常常是在中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女星们，在欧美没有碰过明星裙边的小老板，奇迹般地相遇，闪电战地结婚。且不谈这种几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在中国某些女郎的眼中，这张床可就是一份签证。从床下滚到床上，她便跨过了国界，走入了西方的“极乐世界”。

这是一位传统戏曲演员。虽已年过三十，但尚未婚配，她对男友的态度明确而坚决：缺乏出国的婚姻是一种悲哀，你既不能帮我们出国，结婚的条件当然尚不成熟。幸运的是机会来了。一位年过花甲孤身来华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在她精心导演的一场中餐家宴上，被一曲贵妃醉酒弄得手足无措。当一丝不挂的身躯裹在散发着女人肌香的被褥中，老商人已是魂飞魄散。

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随着“未婚”女子的操作技术渐达专业水平，原本无能的老人重新焕发了雄性的青春，老商人对她已恩爱备至，便决定从长计议，请女旦角在中国办事处兼职，随时应招。她当然不是“看楼婆”，也说要从长计议，最好把男友打发到日本去，免得在这里起干扰破坏作用。

老商人对此等事驾熟就轻，此前已有几位年轻中国靓女由他担保赴日。男友一走，干扰全无，旦角与老商人已如情人一样来往频繁。但依照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的男女关系定律，旦角更为漂亮的妹妹的出国问题也就非办不可了。送走了妹妹，就没有理由不送走哥哥，既然老头已成一条咬了钓饵的鱼，那就索性狠劲儿往下吞。

女旦角的全套赴日手续也全部办妥，但她却按兵不动了，她让已返回日本的老头儿苦苦死等。东京居室的照片和房契寄来了，那位早被打发到日本的男友也回信传捷报：别着急，老色鬼活不了多久了。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咱俩的，多弄些钱，将来在国外才立得住！

好厉害的一个中国女人！美貌、野心、智慧，常常使一个女性登峰造极。中国女人的美人计，终于提高到可以骗外国男人的水平了。面对“躺在身边的阴谋家野心家”，老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爱美吗？

高考来临

1999年7月7日，20世纪中国最后一次高考终于开始了。成千上万的考生在积蓄了多年的准备之后，一起赶赴竞技场。北京时间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常常是一扇扇紧闭的校门分隔开出两个世界：考场内考生们走笔如飞，考场外家长和老师们的焦急地守候。

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已整整22个年头了。一年一度的高考，令全国多少学子悲欢系之，让多少家庭重心相倾。因此也就有了“黑色的七月”、“考试地狱”

等命题。

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大学被看成是人生的一大关口，只有大约4%的学生能被录取，考上大学也就好像是拿到了一张前程光明的车票。于是，中学毕业生们都不遗余力地要挤上这条独木桥。那时，学生主要是选名校、选名教授，考虑能不能学到点东西，想的主要是成才。从现在往前推10年，你还经常会听说某个学生为了上大学，矢志不移，考了一年又一年的故事。

目前，招生比例已经发展到了1:18，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一比例已降低到1:12左右。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考大学是比以前容易多了，学生入学的门路比以前广了，许多是可以降分录取的，如自费、代培、电大等；考不上正规大学还可以上私立大学或成人大学；考不上本科的也可以先上专科，再设法转成本科。现在的区别仅在于成绩好的学生可能出钱少一点，而成绩差的要多出一点。这样一来，各地当年颇为红火的高考补习班也就纷纷停办。因为复读也是要钱的，而且再读一年不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

相对于80年代，现如今学生考虑更多的不是学校而是专业，是如何“成财”。很少有人再接受传统的纯理论的历史哲学等专业，比如有的学校教学优势在中文系而不是在外语系，但考生都是奔外语系，因为外语专业毕业后收入高；准备读研究生的总体上也少了，更多的是为将来的工作打算。学生报志愿除了考虑专业的实用性外，还会考虑父母的势力范围——将来能不能在我们找工作上助一臂之力。

考生这种选择专业注重实用性的趋势，与近年逐步取消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由大学生自谋出路的政策有

关。大学生不再出路无忧，不得不从上大学那一天起就为自己作长远打算。近年报师范专业的人数增多和生物工程之类的专业热度下降也与将来找工作有关。现在教师待遇普遍提高，许多考生不再将读师范视为畏途；读师范找工作有保证，将来收入稳定，还有两个假期，这也使得部分考生将师范作为自己的选择。而某些尖端学科如生物化学等，听起来虽好，但将来找工作实际上并不容易，如果进不了研究所，那就只能去教书了，与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去报考师范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人们对待考大学的态度，是否也变得轻松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广东省教育促进会理事、原任广州市 16 中教导主任的张成淦认为，现在考生面临的问题，不是考得上考不上，而是上什么样的学校，即使是三、四类中学说起来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升学率，一、二类中学及尖子学生因此面临的高考压力更大。有的校长直接就对他的学生说：你们现在不是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是要“一颗红心，一种准备”。

有顺口溜讽喻当今校园道：“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种来自高考的压力，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中学乃至小学，使学生提前介入竞争。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完全是错误的。难怪当今的年轻学子谈起高考，已不会再有他们父辈那样的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正被高考制度所压倒。

虽然说，逐步扩大的高校招生规模和自考、各类成人高校的补充与分流，正在使高考的独木桥一寸寸地加宽，但考生们仍被来自自身和外在的压力重重包围。据了解，上高三以来，每位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不低于 10 个小时。问及他们对高考的看法时，都说它属于应试教

育中突出的基本表现。尽管学校和老师们在素质教育上已做了许多工作，可高考的指挥棒依旧威力无比。

其实，高考前最紧张的还不是考生自己，而是他们的父亲母亲。这些家长们有苦难言，更不敢把内心的不平挂在脸上，免得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自从3月一开学，他们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又是订每日菜谱，又是订每日作息时间表，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临考前的几天，许多父母午饭后都不敢收拾碗筷，生怕影响孩子午休影响孩子学习。晚上把电视音量拧到最小或干脆不看。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开导孩子：尽力而为，但千万别紧张。由此看来，真正需要安慰的是家长而非孩子。

就这样在家长的统一设计和安排下，临战前的孩子们没有了郊游，没有了足球和音乐，生活中只剩下了之乎者也、ABCD、公式定理和种种化学反应……所有的日子，都只是单调的重复，枯燥而无聊，常常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7月7日对于考生来说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转换点，很多的学生们因此脸上写着焦虑，并怀着各种心情一点点地走近它。而说真的老师们也并不比他们轻松多少。高三班的老师们每到六七月间，嗓子总是哑的。每节课他们都太珍惜了，反复叮嘱、讲解，犄角旮旯的知识也不放过，可还觉得有些地方没讲到……心情特别复杂，忽而沉重，忽而轻松，忙乱完之后，发现太阳又落山了，一天天过得如此漫长而又如此短暂。

由高考引发的教育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策划、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的杨东平先生指出：高考制度必须改革。国家教委和有关方